

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綜述

陳麗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趙 晶(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杏雨書屋藏敦煌吐魯番文書(以下行文多簡稱杏雨書屋藏品)的真容,以2009年3月出版的《敦煌秘笈目錄冊》為起點,終於漸次展露在世人面前,我們由此初步得知這批文書有775件(確切地說是775個編號,因為存在不少一號多件文書的狀況)。此後,《敦煌秘笈影片冊一》(2009年10月)、《敦煌秘笈影片冊二》(2010年3月)、《敦煌秘笈影片冊三》(2010年11月)、《敦煌秘笈影片冊四》(2011年3月)、《敦煌秘笈影片冊五》(2011年11月)、《敦煌秘笈影片冊六》(2012年1月)、《敦煌秘笈影片冊七》(2012年3月)、《敦煌秘笈影片冊八》(2012年12月)至最後一冊《敦煌秘笈影片冊九》(2013年3月)陸續出版,學界數年來對杏雨書屋藏品的探訪追尋也終於告一段落。

儘管對有些杏雨書屋藏品的來源乃至真偽仍有疑惑,但并不妨礙學者對這批文書釋錄與研究的熱情,且這種熱情在《敦煌秘笈影片冊》的全面刊佈過程中逐日遞增,正如藤野月子在《2011年日本的隋唐史研究》開篇所說:“2011年延續2010年,隋唐史學界將石刻、《天聖令》、《敦煌秘笈》等作為手段而積極利用”,並在“敦煌·吐魯番”成果介紹部分再次強調:“對《敦煌秘笈》繼續進行考證,成果顯著,期待着像《天聖令》一樣,今後能迎來更深入的研究進展。”^①顯然,作者深刻感受到了學界對杏雨書屋藏品的重視,故將其重要性等同於石刻與《天聖令》,也因此對相關研究的推進給予期望。而這種熱情與期望并存的狀況,不僅在日本學界,在中國學界也普遍存在。

基於中日學者對杏雨書屋藏品的共同興趣和已有的豐碩成果,以及未來廣闊的研究空間,本文擬對目前所見的相關研究成果略作總結和述評。因在《敦煌秘笈目錄冊》與《敦煌秘笈影片冊》出版前(與出版初期),有關杏雨書屋藏品的先期成果已多見於榮新江所製“《李木齋鑒藏敦煌寫本目錄》研究索引稿”、岩本篤志所製“論文·研究書”索引,以及鄭阿財所舉“杏雨書屋《敦

^① 黃正建編譯《2011年日本的隋唐史研究》(原文刊於《史學雜誌》第121編第5號),《中國史研究動態》2013年第3期,第77—84頁。

煌秘笈》的研究現況”，^①故本文僅以《敦煌秘笈影片冊》出版後的成果為主要介紹對象，若有相應追溯則以注釋說明。

要回顧有關研究成果，就得對杏雨書屋藏品的來源、經營、披露過程先略作追溯，也因此勢必涉及三位相關人士。首先，杏雨書屋藏品一半以上源自中國近代著名藏書家李盛鐸；其次，幾乎所有藏品皆由京都大學羽田亨教授經手；再次，最早注意并一直追尋李盛鐸舊藏品去向的是北京大學教授榮新江。其中榮新江的探訪經歷，在其所撰的系列文章中得以清晰再現，^②本文不再贅述，而關於羽田亨所做的相關工作、李盛鐸舊藏敦煌文書的卷數以及學界對杏雨書屋藏品的研究狀況仍略有令人不解之處，值得我們再稍作提示。

首先，羽田亨對杏雨書屋藏品的初步編目。已經公佈的藏品共計 775 (758) 個編號，其中羽 1—432 號原屬李盛鐸所有，這已是學界共識。^③李家曾為這批文書編有《李木齋氏鑒藏燉煌寫本目錄》，羽田亨經手購入這批文書後，據此目錄底本新作了《敦煌秘笈目錄》。後羽田亨又陸續為出資者代購了一些敦煌吐魯番文書并分別編有《新增目錄》(433—670 號)、《短編及斷簡五十種》(671—736 號)^④兩種。不過，作為羽田亨目錄手稿的(間接)委托人(塚本善隆→牧田諦亮→落合俊典)落合俊典，在發表了兩篇關於這三種目錄大致由來和內容的文章後，^⑤便再未披露與此相關的更多細節。更重要的是，羽

① 榮新江《追尋最後的寶藏——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調查記》，劉進寶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5—32 頁，“索引”見第 19—26 頁；收入氏著《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74—90 頁。岩本篤志《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概觀——その構成と研究史》，《西北出土文獻研究》第 8 號，2010 年，第 61—63 頁。鄭阿財《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來源、價值與研究狀況》，《敦煌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116—127 頁。

② 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18 頁。《李盛鐸藏卷的真與偽》，《敦煌學輯刊》1997 年第 2 期，第 1—18 頁；收入氏著《鳴沙集》(改題為《李盛鐸藏敦煌寫卷的真與偽》)，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 年，第 103—146 頁；收入氏著《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第 47—73 頁。榮新江《追尋最後的寶藏——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調查記》，第 15—32 頁。

③ 對杏雨書屋藏品及其來源的追尋與介紹，主要可參見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 218 頁；《李盛鐸藏卷的真與偽》，第 1—18 頁；《追尋最後的寶藏——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調查記》，第 15—32 頁。方廣錕《呼喚〈羽田亨目錄〉中的敦煌遺書早日面世》，“紀念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2000 年 7 月 25—26 日，香港大學中文系；《敦煌遺書早日面世》，《中華讀書報》2002 年 8 月 16 日。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錄”簡介》，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論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91—101 頁；《敦煌秘笈——幻のシルクロード寫本を探して》，《華頂短期大學學報》第 6 號，2002 年，第 15—19 頁；《敦煌秘笈目錄(第 433 號至 670 號)略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7 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174—178 頁；《李盛鐸と敦煌秘笈》，《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2 卷第 2 號，2004 年，第 166—172 頁。高田時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7 卷，第 13—27 頁；《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京都，2007 年，第 1—26 頁；《李滂と白堅・補遺》，《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2 號，京都，2008 年，第 185—190 頁。陳濤《千呼萬喚始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清末李盛鐸舊藏敦煌文書日本面世》，《中國文物報》(第 7 版)，2010 年 3 月 31 日。鄭阿財《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來源、價值與研究狀況》，第 116—127 頁。

④ 以上披露參見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錄”簡介》，第 91—101 頁；《敦煌秘笈目錄(第 433 號至 670 號)略考》，第 174—178 頁。高田時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第 18—22 頁。榮新江《追尋最後的寶藏——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調查記》，第 17—18 頁。

⑤ 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錄”簡介》，第 91—101 頁；《敦煌秘笈目錄(第 433 號至 670 號)略考》，第 174—178 頁。

田亨所編後兩份目錄中的文書是否能與《敦煌秘笈影片冊》所刊文書一一對應，^①也因尚未刊發目錄全文而難以對照。杏雨書屋藏品的編號延至羽 775 號，那麼，或如文書編號次序順延，《敦煌秘笈影片冊》中所餘第 737—775 號文書是否仍由羽田亨經手購入以及是否也有一份初始目錄存在，目前同樣沒有披露任何相關信息。

其次，李盛鐸舊藏敦煌文書的卷數。李盛鐸藏有敦煌文書的消息在民國時逐漸傳開，羅振玉、羽田亨、瀧川政次郎等皆有機會目睹其中部分文書，但對李氏所藏的總卷數並不詳知，較早如羅振玉在 1919 年 7 月 2 日給王國維的信中曾有“多至四五百卷”的推測。^② 學界一般依據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③之散錄三《李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據傳鈔本)》、^④散錄四《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據《學觚》第一卷第七期)、散錄五《李木齋舊藏敦煌名迹目錄(第一部分)》、^⑤散錄六《李木齋舊藏敦煌名迹目錄(第二部分)》^⑥窺知李氏舊藏的大致內容及總卷數。^⑦ 又據叶恭綽《寄傳庵敦煌圖錄序》載，他曾介紹中央圖書館購入李氏舊藏 200 餘卷，^⑧但據榮新江調查，臺北藏卷中並未見李氏印鑒，“這似與李氏收藏習慣不符，也說明叶恭綽所介紹的寫卷并非李氏藏卷的真品或核心部分”。^⑨ 再據陳濤最近統計，羽 1—432 號文書中有李氏印鑒者僅有 104 號，^⑩所佔比例不足 25%，可知李氏舊藏品的印鑒率并不高，有相當部分藏品上確無印鑒。再看杏雨書屋藏品，除了前 432 號，我們對其他 300 多號文書上的收藏印鑒進行統計，計有羽 594、597、601、614、617、619、621—623、626、627、630、632、636—639、650、653、658、660、662、668、669、

① 據高田時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第 20—22 頁]與落合俊典[《敦煌秘笈目錄(第 433 號至 670 號)略考》，第 174—178 頁]披露，《新增目錄》中的第 433、459、460、469、561、617、639、663 等號文書的編號及內容(除了一些文書的定名有所變動外)，與《敦煌秘笈影片冊》所刊編號羽 433—663 等號文書皆能對應，《新增目錄》中的文書編號即對應羽 433—670 號，以此類推，《短編及斷簡五十種》(671—736 號)目錄所著之第 671—736 號或即對應羽 671—736 號。

② 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 602 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年，第 459 頁。

③ 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年，收入《敦煌叢刊初編》第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下引四種目錄見於此書第 318—326 頁。

④ 此即據《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轉抄。

⑤ 據榮新江考證，其中著錄的幾件文書現藏北京圖書館，參見榮新江《李盛鐸藏卷的真與偽》，第 3 頁。又據王素等考證，其中著錄的 2 件寫經現藏故宮博物院，參見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宮博物院院刊藏敦煌吐魯番文獻提要》(寫經、文書類)，《故宮學刊》第 3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第 562—581 頁。

⑥ 其中著錄的寫經等 44 件，現已知多歸上海圖書館藏，參見吳織、胡羣耘《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附傳世本寫經及日本古寫本》，《敦煌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93—107 頁；《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續)——附傳世本寫經及日本古寫本》，《敦煌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89—101 頁。

⑦ 陳濤斷定李盛鐸所藏敦煌文書總數為 560 件，除了根據以上目錄和一些李氏印鑒的推算外，並未有更多依據，故這一數據不足為信。參見陳濤《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中李盛鐸藏書印管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0 年第 4 期，第 74—81 頁。

⑧ 張虹《敦煌圖像徵考錄》，香港弘道藝術院，1963 年，第 5 頁。

⑨ 榮新江《李盛鐸藏卷的真與偽》，第 3 頁。

⑩ 陳濤《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中李盛鐸藏書印管見》，第 80 頁。

671、674、675、678—680、686、694、700、706、716、717、719、722、725、727、735、738—744、746、748—750、752、757—760、763、764、767、768、775 等 62 號文書上也出現了各種李氏印鑒，如“木齋審定”、“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慶嘉館印”、“李盛鐸印”、“木齋真賞”等（本文暫不論印鑒或有相關印鑒文書的真偽），說明其中有一些確實曾為李盛鐸所藏。還如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藤井友鄰館、寧樂美術館、天理圖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等其他收藏機構的敦煌文書中也時有李氏印鑒；^①中國故宮博物院、上海圖書館以及天津藝術博物館^②等收藏機構中也皆有李氏舊藏品，再結合已確知相當數量李氏舊藏品上並無印鑒的狀況，那麼，李盛鐸舊藏的總卷數到底有多少，乃至這些藏品的流散過程，仍須學界長期探尋。

第三，關於杏雨書屋藏品的研究狀況。儘管目前尚未完全明確杏雨書屋藏品的全部來源，但對其大概情況已有所把握，如羽 1—432 號為李盛鐸舊藏，羽 433—436、448、450、456、457、461、463、464 等號購自同一人物或（業者）；^③羽 474—477 等號為吳芝瑛舊藏，羽 501—550 號為富岡謙次舊藏，羽 561 號為梁素文舊藏，羽 609 號為王樹枏舊藏；^④羽 551—590 號為清野謙次舊藏^⑤等。其中，李盛鐸舊藏無論在質量還是數量上都居各家藏品之首，也是學者長期以來研究或追尋的主要對象。李盛鐸舊藏品未出售前，松本文三郎、羅振玉、羽田亨、瀧川政次郎等不僅曾親見部分精品，還對其中一些佛經如《摩訶衍經第八》、《十戒經》等，以及其他文書如《唐律》、《漢書》、《志玄安樂經》等進行圖版刊發或介紹研究。長期以來，其他學者多據以上圖版或抄本繼續研究，這是對於（李盛鐸舊藏或者說大部分）杏雨書屋藏品研究的第一個階段，特點是因所知原卷或圖版有限，成果相對單一，但中日學者皆參與其中。羽田亨在購入第 1—432 號即李盛鐸舊藏品後，曾將其中一些文書拍攝成 933 張照

① 饒宗頤《京都藤井有鄰館藏敦煌殘卷紀略》，徐亮之編《金匱論古綜合彙》第 1 期，香港：亞洲石印局，1955 年，收入《選堂集林·史林》下，香港中華書局，1982 年，第 998—1010 頁；王三慶《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典藏之敦煌寫卷》，《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 年，第 88—89 頁；陳國燦《東訪吐魯番文書紀要（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2 期，1993 年，第 40—45 頁；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敘錄（二）》，《敦煌研究》1994 年 3 期，第 90—100 頁；陳國燦《東訪吐魯番文書紀要（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3 期，1994 年，第 32—43 頁；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敘錄（三）》，《敦煌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51—61、68—70 頁；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 171—174、194—212、215—217 頁。

②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書共計 350 件，其中 256 件為周叔弢舊藏品，周氏藏品中有不少即購自李盛鐸，參見劉國展、李桂英《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附傳世本寫經》，《敦煌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74—95 頁；云希正《周叔弢和他收藏的敦煌遺書》，《收藏家》1998 年第 6 期，第 22—25 頁。

③ 落合俊典《敦煌秘笈目錄（第 433 號至 670 號）略考》，第 174—175 頁。

④ 據高田時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大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第 22 頁；落合俊典《敦煌秘笈目錄（第 433 號至 670 號）略考》，第 174—178 頁；岩本篤志《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概觀——その構成と研究史》，第 55—59、75—76 頁；以及《敦煌秘笈影片冊》中刊發的收藏印鑒歸總。

⑤ 據《日本諸私家所藏敦煌寫卷目錄》（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散錄十三，第 336—337 頁）、高田時雄《清野謙次蒐集敦煌寫經の行方》（《漢字と文化》第 9 號，2006 年，第 9—11 頁）、岩本篤志《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概觀——その構成と研究史》（第 55—59、76—77 頁）所刊清野謙次藏品目錄與《敦煌秘笈影片冊》相關內容對比確定。

片,以供自己研究所用,這批照片俟其去世後歸“羽田亨紀念館”所有,後被裝訂成冊并命名《羽田博士收藏西域出土文獻寫真》。^① 榮新江、池田溫、落合俊典、岡西爲人、牧野和夫、山本達郎、湯谷祐三、岩本篤志、土肥義和、林敏、張娜麗等皆利用這批照片進行了研究,這是對於(李盛鐸舊藏的精華或者說大部分)杏雨書屋藏品研究的第二個階段,特點是因所見圖版增多,研究視角更爲寬廣,成果也更加多面。但由於各種原因帶來的交流不便,這一時期的研究多由日本學者完成。自2009年《敦煌秘笈目錄冊》與《敦煌秘笈影片冊》陸續出版至今,學界對於杏雨書屋藏品的研究進入了第三個也是全新階段,尤其較之以往,有關杏雨書屋藏品的信息已經衆所周知了,學者通過各種渠道對這批文書進行研究已非難事,因此中日學者皆能參與其中,對杏雨書屋藏品的關注面也拓展到了全部卷號而非止於前432號,所取得的成果也更加顯著。

下文即對《敦煌秘笈影片冊》刊佈已來,學界的各項活動以及相關成果作一簡要介紹與總結。

日本學界的主要活動:2010年4月19—24日,杏雨書屋在大阪舉辦了“敦煌の典籍と古文書”特別展示會,分中國の古典、法典と公文書、學習と教育、生活と信仰四個主題展出了58件文書原卷。^② 東洋文庫・內陸アジア出土古文獻研究會的例會也安排了一系列有關杏雨書屋藏品的報告,池田溫、岡野誠、片山章雄、岩本篤志、陳濤等皆作過報告。杏雨書屋也組織了“和漢の本草書——中世以前の写本と刊本”、“敦煌の典籍と古文書”爲主題的學術報告會,《杏雨》雜誌第13、14、15、16期(分別出版於2010、2011、2012、2013年)刊發了一批相關文書研究成果;2010年4月,高田時雄在中國杭州舉行的“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作了《關於李盛鐸舊藏敦煌遺書的公開出版》的發言,介紹了《敦煌秘笈影片冊》出版的各種信息,在《敦煌寫本年報》第5、6、7號(分別出版於2011、2012、2013年)中也集中刊發了由高田時雄主持的讀書班陸續研讀杏雨書屋藏品的一批相關成果。日本學者如池田溫、高田時雄、岡野誠、落合俊典、岩本篤志、山本孝子等更是長期關注杏雨書屋藏品并有大批相關成果面世。

中國學界的主要活動:2010年10月以來,在敦煌研究院文獻所與甘肅省

① 關於這批照片的介紹可參見榮新江《追尋最後的寶藏——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調查記》,第16—19頁;土肥義和《〈羽田亨博士搜集西域出土文獻寫真〉調查記》,《唐代史研究》第7號,2004年,第1—2頁;張娜麗《羽田亨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獻寫真〉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史學》第50號,2006年,第1—64頁。

② 有關展覽情況的介紹可參見財団法人武田科學振興集團《第54回杏雨書屋特別展示會“敦煌の典籍と古文書”》(介紹圖冊),大阪,2010年4月;陳濤《日本學界的〈敦煌秘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2月9日;池田溫《敦煌秘笈の價值》,《杏雨》第14號,2011年,第167—182頁。

敦煌學會聯合主办的“敦煌讀書班”活動中,高啓安、馬德、王祥偉皆以杏雨書屋藏品爲主題作了講座。中國人民大學張風雷牽頭的“《敦煌秘笈》研究”小組,主要研讀《秘笈》所收南北朝時期的佛教文獻。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黃正建、吳麗娛、楊寶玉、牛來穎、雷聞、陳麗萍、王卡、張總、劉志;武漢大學的陳國燦、浙江師範大學的張涌泉、浙江大學的許建平、蘭州大學的劉永明、中國政法大學的趙晶、湖南科技大學的聶志軍、蘭州商學院的王祥偉、北京師範大學的陳濤等皆有不同方向的相關研究。王祥偉、陳麗萍與趙晶、陳濤等申報了相關課題,其中王祥偉主要研究社會經濟文書,陳濤以對李盛鐸舊藏品的輯錄與研究爲主,陳麗萍與趙晶則對全部社會經濟文書進行了釋錄并作了一些研究,尤其注重敦煌文書與《天聖令》文的結合,目前已經完成了200多件社會經濟文書的釋錄。中國敦煌學界重要的學術刊物如《敦煌學輯刊》、《敦煌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近年來也持續刊發有關杏雨書屋藏品的研究成果。

近年來有關杏雨書屋藏品的研究成果,可大致分爲概括性介紹與研究、對已有研究的繼續或推進、對某(幾)件文書的個案研究以及對某類文書的整體研究四個方面。

概括性的介紹與研究:如池田温《敦煌秘笈の價值》(《杏雨》第14號,2011年)介紹了2010年杏雨書屋藏品特展的情況以及當時日本學界對這批文書的研究狀況,特別指出其中的“法典與公文書”、“學習與教養文書”是研究敦煌居民家族和日常生活的珍貴史料。岩本篤志《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概觀——その構成と研究史》(《西北出土文獻研究》第8號,2010年)介紹了杏雨書屋藏品的出版經歷、研究史及文書構成,還附有參考文獻、編號對照、收藏印鑒與研究成果一覽表,便於學界參考。陳濤也介紹了《敦煌秘笈》出版後日本學界的反響及研究現狀(《日本學界的〈敦煌秘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2月9日)。在杏雨書屋藏品全部刊發完畢後,作爲整理者的古泉圓順於2013年5月作了《巷談〈敦煌秘笈〉》(龍谷大學アジア仏教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度第1回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談話會)的演講,介紹了自己多年來從事文書整理工作的全過程。

對已有文書研究的繼續或推進:有關杏雨書屋藏品的研究可分作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的研究皆在藏品尚未公佈的前提下進行,學界利用有限的圖版或錄文,對其中的景教、佛教以及社會經濟文書進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如杏雨書屋所藏的4件漢文景教文書(依次編號羽13、431、459、460)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對其來源、真偽、錄文及所反映的教義等問題有過激烈探討,後隨着《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河南洛陽)出土,敦煌文書與經幢的對校又成爲

一時之潮流，馮其庸、羅紹、林悟殊等皆有此類研究。^①而如今，文書內容的比對與詞彙分析則成爲新的研究動向，如項秉光《三種景教敦煌寫卷考釋》（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對羽459、460、13號三種文書的經題、譯名、結構、底本、抄本、翻譯以及錄文校勘等進行了全面考釋。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首先概述了唐代景教文獻及研究狀況，其次闡述了景教文獻詞語研究的價值，進而說明了具體研究方法，最後落實到釋字與釋詞兼及景教文獻詞語來源的梳理。此後，作者陸續發表如《唐代景教的本土化策略——以詞語釋義爲例》（《社會科學家》2010年第3期）、《唐代景教〈序聽迷詩所經〉中“移鼠”漢譯釋疑》（《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3期）等文，從語言文字學的角度深化了對景教文書及唐代景教史的研究。

羽20《唐律疏議》殘卷最早由羅振玉刊佈，^②該卷也爲法制史學者長期關注，最近如岡野誠《杏雨書屋所藏唐開元雜律疏斷簡の再検討》（東洋文庫・内陸アジア出土古文獻研究會12月例會，2009年）、陳濤《日本杏雨書屋藏唐代敦煌本〈雜律疏〉殘卷略說——原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3期）、辻正博《敦煌・トルファン出土唐代法制文獻研究の現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6號，2012年）、黃正建《唐代法律用語中的“款”和“辯”——以〈天聖令〉與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中心》（《文史》2013年第1期）等文皆對該卷有所涉及。

對已有研究繼續或推進的成果還包括了史地、醫藥、經濟、文學等方面。如岩本篤志《敦煌本〈霸史〉再考——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十六國春秋〉斷片考》（《資料學研究》第7號，2010年），陳勇《〈敦煌秘笈・十六國春秋〉考釋》（《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對羽38、72aR號^③究竟爲《十六國春秋》還是《霸史》抄本以及其他可能的文獻來源等問題進行了再辨析。

岩本篤志《敦煌と〈新修本草〉——なぜそこにあったのか》（《杏雨》第13號，2010年）與《〈新修本草〉序列の研究——敦煌秘笈本の検討を中心に》（《杏雨》第14號，2011年）、上山大峻等《敦煌本〈本草集注〉について》（《杏

① 馮其庸《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全經的現世及其他，《中國文化報》2007年9月27日。羅焯《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幢記〉石幢的幾個問題》，《文物》2007年第6期，第30—42、48頁。林悟殊、殷小平《經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一》，《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1期，第325—352頁；殷小平、林悟殊《〈幢記〉若干問題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二》，《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2期，第269—292頁。

② 羅振玉輯《敦煌石室碎金》，東方學會，1925年，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99—105頁。

③ 初期研究參岩本篤志《羽田亨記念館所藏〈西域出土文獻寫真〉766・767〈十六國春秋〉考——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をめぐって》，《西北出土文獻研究》（創刊號），2004年，第5—39頁。

雨》第 13 號)一直對羽 40R《本草經序并卷上》^①進行追蹤研究。

片山章雄《大谷探險隊將來吐魯番出土物價文書斷片の數點の綴合について》(《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東洋文庫,2009 年)與《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中の物價文書と龍谷大學図書館大谷文書中の物價文書》(《内陸アジア史研究》第 27 號,2012 年),確定了吐魯番文書羽 561 號^②與大谷 3449、3078、3075、3095 等號的綴合關係,證明該卷也是《唐天寶二載交河郡市估案》長卷之部分。陳國燦《讀〈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劄記》(《史學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對羽 24R、27-1、28 號^③再次過錄并研究,指出羽 24R 號與羅振玉舊藏與 P. 2592 等號綴合而成的《唐天寶六載敦煌郡敦煌縣龍勒鄉都鄉里籍》為同組文書,且與羅振玉舊藏卷可綴合;判定羽 27-1 號中的“癸未年”為咸通四年(863);指出羽 28 號與 Дх. 2954a 號形制完全一致,也應為同組文書。荒見泰史《舜子變文類写本の書き換え状況から見た五代講唱文學の展開》(《アジア社會文化研究》第 11 號,2010 年)、鄭阿財《從〈敦煌秘笈〉羽 39V 殘卷論〈舜子變〉的形成》(《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年)、玄幸子《羽 39V を中心とした變文資料の再検討》(《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5 號,2011 年)、高井龍《舜の舌による瞽叟開眼故事の流佈について》(《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7 號,2013 年),從不同角度研究了羽 39V 號,^④指出該卷是“舜子至孝變文”產生和成型的過程中的重要史料。

對某(幾)件文書的個案研究,這也是目前所見成果中內容最為豐富和最具創新的部分,內容涉及經籍、史地、經濟、社會、文學、科技、宗教信仰等多方面。

經籍:杏雨書屋藏經籍類文書計有《論語》、《毛詩》、《春秋》、《禮記》、《尚書》等卷,許建平《杏雨書屋藏論語殘片三種校錄及研究》(“從抄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學術研討會論”論文,2011 年),先對羽 14 號中的 3 件《論語》殘片進行校錄,接着指出羽 14-1 號與 S. 6121 號可綴合、羽 14-3 號

① 初期研究參岡西為人《本草概説》圖版 6,創元社,1983 年;岩本篤志《唐朝の醫事政策と〈新修本草〉——李盛鐸將來本序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史學雑誌》第 114 編第 6 號,2005 年,第 36—60 頁;岩本篤志《文字と紙背から見た敦煌における〈新修本草〉——コンピュータによる用字整理を通して》,《唐代史研究》第 9 號,2006 年,第 56—72 頁;岩本篤志《敦煌本〈新修本草〉校注初稿》,《資料學研究》第 4 號,2007 年,第 99—124 頁;岩本篤志《唐〈新修本草〉編輯と“土貢”——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斷片考》,《東洋學報》第 90 卷第 2 號,2008 年,第 113—143 頁。

② 初期研究參池田温《盛唐物價資料をめぐって——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の斷簡追加を中心に》,《シルクロード研究》(創刊號),創價大學,1998 年,第 69—90 頁。

③ 初期研究參池田温《敦煌郡龍勒鄉天寶六載籍の一斷簡》,《創價大學人文論集》第 10 號,1998 年,第 251—260 頁;池田温《李盛鐸舊藏敦煌歸義軍後期社會經濟文書簡介》,《慶祝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第 29—56 頁。

④ 初期研究參湯谷祐三《新出敦煌孝子傳資料と變文の關係——羽田記念館所藏〈西域文獻資料寫真〉所收孝子傳資料をめぐって》,《同朋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23 號,2004 年,第 87—104 頁。

與 P. 2661 號或有所關聯。許建平《杏雨書屋藏〈詩經〉殘片三種校錄及研究》(《慶祝饒宗頤先生 95 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12 年),對羽 15 號中的 4 件《詩經》殘片進行重新定名和校錄,指出羽 15-1 號與 P. 2669 號可綴合、羽 15-2-1R 與 15-2-2R 號與 Dx. 0588 號可綴合、羽 15-3 號與 S. 3330、P. 2978、S. 6346、S. 6196 等號為同卷。王天然《讀杏雨書屋所藏八件經部敦煌寫本小識》(《亞洲研究》第 16 期,韓國,2012 年)對於羽 14、15 號的相關研究與許建平大致相同,此外,還指出羽 16《春秋》寫卷與 Dx. 04512、Dx. 01712 號或為一卷,羽 18《尚書》寫卷與 S. 2074 可綴合。張涌泉、張新朋《敦煌殘卷綴合研究》(《文史》2012 年第 3 期)完成了 P. 4988 + 羽 19V《莊子·讓王篇》的綴合(也實現了兩卷背面綴合為完整的《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一卷)。

史地:池田昌広《敦煌秘笈の〈漢書〉殘卷》(《杏雨》第 16 號,2013 年)過錄了羽 432 號,分析了該卷與其他漢書抄本的異同。陳國燦《讀〈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劄記》(《史學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推測羽 25V 號狀文中令狐良嗣的職務為倉史。趙晶《羽 25V〈倉夫令狐良嗣牒〉補說——兼論〈倉庫令〉宋 1 的唐令復原問題》(《中國史研究》第 90 輯,韓國,2014 年)根據英藏、法藏敦煌文書以及唐代四等官制的押署體例,論證令狐良嗣所任為倉史,補證了陳國燦的論點,并借此討論了與倉儲相關的唐代律令制度以及據天聖《倉庫令》宋 1 復原唐令的相關問題。馬德《吐蕃國相尚乞心兒事迹補考——以杏雨書屋羽 077 號為中心》(《敦煌研究》2011 年第 4 期)為羽 77 號中兩件涉及尚乞心兒的願文重新擬名,判定其成文年代應在 816—818 年間,指出該卷反映了尚乞心兒一度代領敦煌,後又率軍西征於 9 世紀初返回敦煌的一段史實。赤木崇敏《唐代敦煌縣勘印簿羽 061, BD11177, BD11178, BD11180 小考》(《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5 號)確定了羽 61 號與 BD11177 等號的綴合關係,認為這是敦煌縣發出、點檢官文書所押官印的勘印簿。速水大《杏雨書屋所藏敦煌秘笈中の羽 620-2 文書について》(《內陸アジア出土 4—12 世紀の漢語・胡語文獻の整理と研究》,2011 年)判定羽 620-2 號是蒲昌折衝府與縣等官府交換的文書,為著名的蒲昌府文書又加入一件新文書。高田時雄《李盛鐸舊藏〈驛程記〉初探》(《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5 號)指出羽 32 號中的“沙州專使”為入朝途中的歸義軍使團,其寫作上限在太和四年(830);李軍《晚唐五代歸義軍與涼州節度關係考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1 年第 6 期)則認為“沙州專使”當為大中五年(851)十月入朝的張議潭使團;陳國燦《讀〈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劄記》(《史學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斷定該卷大概作於大中二年(848)至咸通二年(861)間,并逐一考證了每段行程中出現的地名。

經濟：王祥偉《日本杏雨書屋藏四件敦煌寺院經濟活動文書研讀劄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3期）首先為羽52、羽65號兩件算會牒重新擬名，指出它們在某些細節上與其他敦煌本算會牒的不同之處；指出羽64號賣舍契不僅提供了寺院購買屋舍的實例，也為認識寺院財產管理提供了另一視角；其次指出羽68號文書對全面了解寺院與酒戶間的關係提供了新資料。高啓安《一件珍貴的敦煌僧人宴飲記錄——〈敦煌秘笈〉羽067R、羽067V文書初解》（《寒山寺佛學》第7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12年）指出羽67號正反面同時記錄了僧界舉辦“六折福戒禮”、“六折都師禮”時的食物分配狀況和飲食過程，透露了僧人集體飲食活動中的各種組織與分配食物乃至食物名稱的情況。陳國燦《讀〈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劄記》（《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1期）確定了羽36R號是能與P.3841號綴合的開元年間《沙州會計歷》殘卷之一。

社會生活：岩本篤志《敦煌秘笈“雜字一本”考——“雜字”からみた歸義軍期の社會》（《唐代史研究》第14號，2011年）認為羽41R號是歸義軍時期的民間童蒙教材，該卷除了具有識字功能外，還有一些明顯的地方特色。《〈蘭亭序〉在西域》[《國學的傳承與創新：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與科研六十周年慶賀學術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將和田出土的俄藏Дх.18943-1號與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GXW0122、GXW0017號，以及羽664V號習字抄本與法藏P.2544號等已知《蘭亭序》抄本進行對比，借以探究唐代書法文化的西漸與傳播。黑田彰《杏雨書屋本太公家教について——太公家教攷・補(2)》（《杏雨》第14號）、《抜き取られた敦煌文書：何彦昇、鬯威のことなど・太公家教攷・補(3)》（《京都語文》第19號，2012年）確定羽664-1號當為《太公家教》殘片，並對不同敦煌抄本進行對比研究。蔡淵迪《杏雨書屋藏敦煌舞譜卷子校錄并研究》（《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校錄了羽49號，將其與S.5643號等敦煌舞譜進行了比對研究。山口正晃《羽53〈吳安君分家契〉について——家産相續をめぐる一つの事例》（《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6號）過錄了羽53號，並就其中涉及的家産分配及相關法律制度進行了探討。

文學：張涌泉《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敦煌文獻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完成了羽57與S.0962《秦婦吟》寫本的綴合。陳麗萍《杏雨書屋藏〈秦婦吟〉殘卷綴合與研究》（《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也涉及了羽57R與S.0692號的綴合，並回顧了有關敦煌本《秦婦吟》研究的學術史。佐藤礼子《羽094R〈（擬）天台智者大師智顛別傳〉初探》（《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7號，2013年）分析了羽94R號的內容與構

成,辨析了其中一些關鍵詞彙,進而比較了智者大師別傳的各種異本。

科技: 金少華《跋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本〈算經〉殘卷》(《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4期)確定羽37R號可與S.19及Дх.03903號綴合,與P.3349、S.5859同為一書,兩種抄本所據可能為同一底本。鄧文寬《跋日本“杏雨書屋”藏三件敦煌曆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為羽41V1、羽41V2、羽40V號3件曆日文書分別擬名并判定其所屬年代。陳明《西域出土醫學文書的文本分析——以杏雨書屋新刊羽042R和羽043號寫卷為例》(《慶祝饒宗頤先生95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釋讀了羽40R、羽42R、羽43號3件醫藥文書,對其中涉及本草、醫療、養生與民俗的內容進行了分析,指出後兩種文書不僅與中外醫學交流有密切關係,其文本結構也值得深入研究。

宗教信仰: 岩本篤志《敦煌占怪書〈百恠圖〉考——杏雨書屋敦煌秘笈本とフランス國立圖書館藏本の關係を中心に》(《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5號)指出羽44號與P.3106《百恠圖》為同一典籍的不同抄本,還分析了該卷與S.3877、P.2682、S.4400號間的各種關聯。劉永明《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道教及相關文獻研讀劄記》(《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3期)對羽30R、羽72aV + 羽38V、羽72b-1、羽72b-2、羽15、羽44、羽40R等8件道教相關文書進行了釋讀、定名與研究。周西波《〈敦煌秘笈〉“羽072b”寫卷的性質與意義》(《慶祝饒宗頤先生95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指出羽72b號中記載了包括度亡、禳疾及滿月等吉凶有關的齋文,該卷應是民間道教齋文和啓白、說法內容的抄錄,屬於齋文範本。西本照真《杏雨書屋所藏三階教寫本〈人集錄明諸經中對根淺深發菩提心法〉一卷(羽411)翻刻》(《東アジア仏教研究》第10號,2012年)對羽411《人集錄明諸經中對根淺深》中涉及的教義有所研究。張文良《“南朝十地學”的一個側面——以法安的“解十地義”為中心》(“第三屆河北禪宗文化論壇研討會”論文,2013年5月)指出羽271號中既有法安對“十地”義的直接闡述,也有與其他法師之間的往復論辯,比較完整地記錄了法安關於“十地”的思想,是了解5世紀末南朝佛教“十地”思想的重要資料。

對某類文書的整體研究: 這類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典籍或信仰方面,如劉永明《敦煌占卜文書中的鬼神信仰研究》(《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5號)對敦煌占卜文書中(包括羽15號)的發病書、六十甲子曆、具注曆日、五兆卜法、逆次占、靈棋卜法等幾類文書中的鬼神信仰進行了梳理、考察和討論。山口正晃《〈十方千五百佛名經〉全文復元の試み》(《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5號)利用現有敦煌本《十方千五百佛名經》寫卷(包括羽698V),依次復原十方佛的諸佛名號。王友奎《敦煌寫本〈咒魅經〉研究》(《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

將已知的敦煌本《咒魅經》寫本分為六種體系(其中羽 96 號可歸入第一種),指出驅鬼治病、消災祈福是此經最主要的實用功能。鄭阿財《論日本藏敦煌寫本及古寫經靈驗記的價值》(《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7 號)舉例和對比研究日本藏各種形式和版本的靈驗記抄本(包括羽 192 和羽 184 號),特別指出羽 184《誦持金剛波若波羅蜜經靈驗記》的內容及價值并校錄了該卷。朱鳳玉《敦煌〈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普門品)殘卷新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7 號)搜集了 6 件敦煌本《法華經講經文》(包括羽 153V 號),描述了各件寫本的特徵,分析了各寫本的異同和研究價值。鄭阿財《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來源、價值與研究狀況》(《敦煌研究》2013 年第 3 期)對比了日、俄、韓國所藏的《金剛般若經開玄記》抄本或刻本,關注了羽 446 和羽 550 號,指出敦煌抄本對佛教文獻學斟補、輯佚及考訂的價值,以及考察金剛經注疏發展的功用。

綜上大致的分類和列舉,我們看到目前有關杏雨書屋藏品的追尋或研究呈現出的一些特色:

第一,藏品本身內容豐富多樣,因此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涉及宗教和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

第二,學界保持對已有研究的繼續和推進的傳統,對某類文書進行長期追蹤和深入發掘。

第三,對一些文書的最新研究,一般都會有較高質量的釋錄文,也會注重將其與其他同類敦煌文書進行比對或綴合。

但我們也看到,所有相關研究還是相對集中於李盛鐸舊藏品中,對杏雨書屋藏品的全面認識也略有欠缺,還有一些學者對先期研究成果不太關注,重複研究的現象也比較多見,相信這些問題在今後的研究中應該會逐漸得以改善。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新出中、日藏敦煌吐魯番法制文獻與唐代律令秩序研究”(項目號:14CFX056)的階段性成果。